

從吉川唐宋詩風之別論宋詩航海書寫的精神特質

顏智英*

摘 要

吉川幸次郎論及唐宋詩風之別時，曾提出宋詩較唐詩更富哲思與揚棄悲哀的人生觀，本文據此先觀察出唐代 200 多首航海詩大致體現出宦途失意之憂、海上生計之苦、海上軍事之險、送友航行之愁等四種「憂」的書寫類型，然後再由 1400 多首宋代航海詩中選取代表作近 50 首為研究對象，結合寫作背景，從歷史的視角考察宋詩對上述唐詩四種航海之「憂」類型的新變之處，具體觀察出其內涵除了對唐航海詩「憂」的淡化與超越外，還新增「喜」的特質，不僅印證吉川的觀點，亦可作為理解宋代文人的新取徑；同時，也見出宋詩航海書寫所展現的異於傳統詩歌的、閑淡自適與激昂壯闊兼而有之的藝術風格與特徵。

關鍵詞：宋詩、航海書寫、精神特質、吉川幸次郎、唐宋詩風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教授。

An Essay about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of Nautical Writing in Song Poetry Based on the Yoshikawa's Viewpoint of the Different Styl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Yan, Jy-Ing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bstract

Yoshikawa Kojiro appointed that much more good thoughts and worldviews of sublet sorrow existed in Song poetry than Tang poetry. This paper observes that more than 200 Tang Dynasty nautical poems generally induct four writing types of th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 of "sorrow." By choosing 50 poems from 1400 nautical Song poems to analyz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oets' writing background, we study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bove four writing types of Tang poetry in Song poetry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find that these poems not only downplayed and transcended "sorrow," but further included a new feature of "joy." It confirms Yoshikawa's viewpoint and serves as a new path to understanding the Song literati. Moreover, it reveals Song's artistic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 and combined with idle and bold nautical writing of Song poetry.

Keywords: Song Poetry, Nautical Writing,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Yoshikawa Kojiro, Tang and Song Poetry Style

從吉川唐宋詩風之別論宋詩航海書寫的精神特質*

顏智英

一、前言

岸邊觀海的感受，不如乘船航海、置身海洋來得深刻；航行海上，有風濤、海族、海盜等威脅，充滿著不可預知的危險，在此生死存亡之際，也最能感受到生命的不可預測性，從而會引發對人生的種種思維。書寫航海經歷的詩歌，除了真實記錄航海活動外，也是詩人「對航海的審美想像、事理灼見等的藝術再現」。¹但由於受到航海技術、海上交通等條件限制的緣故，唐朝以前詩作極少航海相關的書寫，詩人大多僅能置身海畔，遙望海洋。

唐代，造船和航海技術已有長足的進步，航海貿易也促進了與海外各國的航海往來，以致因貶謫、謀生、軍事、出使等因素而航海的相關詩作漸多，據夏燕梅的統計約有 158 首²，據筆者檢索《全唐詩》的統計則約有 228 首。及至宋代，更因城市的繁榮使手工業和商業較之唐朝有顯著進步，為海運業發展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加以當時造船業和航海技術的巨大飛躍³，使宋朝的航海事業比唐朝又有更大進展。同時，詩人或設籍沿海，或長期濱海為官，有較多的親海、航海經驗；再加上更重視日常生活的書寫、對人的世界更具興趣⁴，因此，書寫航海的詩人大增，詩作數量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計畫編號 MOST 108-2410-H-019-010。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¹ 王紅杏：《宋代涉海韻文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頁 147。

² 夏燕梅：《唐代航海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2。

³ 徐鴻儒主編：《中國海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79-81。

⁴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頁 14、46。

亦由唐的 200 多首急增至 1400 多首，其中，北宋相關詩作約 600 首，南宋則約 800 首。清代朱庭珍《筱園詩話》稱：「宋人承唐人之後，而能不襲唐賢衣冠面目，別闢門戶，獨樹壁壘」⁵，張高評指出，此乃因宋詩受文學趨勢、哲學思潮、人生觀感、文化走向、政治環境，以及時風世俗之影響，而有此「翻轉變異」之獨特風格。⁶而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更明白指出此有別於唐詩的「獨特風格」為：具有明顯的敘述性、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富於社會意識與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的人生觀、追求寧靜安祥的心境等傾向或特色。⁷據此，宋詩的「航海書寫」是否亦呈現出有別於唐詩的，富於社會意識與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的人生觀、追求寧靜安祥心境的「別闢」、「翻轉變異」之處？其具體內涵頗值得探究。

因此，筆者承吉川唐宋詩風之論，先觀察唐 228 首航海相關詩作，的確充滿著強烈的「憂」的精神特質，並參考夏燕梅之分類，歸納出下列四種唐詩航海之「憂」的書寫類型⁸：

（一）宦途失意之憂：多以孔子「乘桴浮海」⁹之典與已航行失方的情境，抒寫其仕途不順、人生茫無定向的深憂，如武周長安 3 年（703）因忤旨流放欽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的張說（667-730）有〈入海二首〉其一：「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茫茫失方面，混混如凝陰。雲山相出沒，天地互浮沈。萬里無涯際，云何測廣深。潮波自盈縮，安得會虛心。」¹⁰又如一生未嘗入仕、經常遠行漫遊求晉身機

⁵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 2，頁 33。

⁶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以翻案詩、寓言詩、詩中有畫為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10。

⁷ 詳參〔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頁 9-40。

⁸ 夏燕梅將唐代航海詩分「史學價值」、「文學價值」兩大類論述，其中「史學價值」又細分航海安全、海上軍事活動、海外政治交往、海上居民等四種類型，「文學價值」則分別論述海洋意象、精神內涵（孤獨感與憶鄉懷闕愁緒、積極進取的航海精神）、藝術風格。詳參夏燕梅：《唐代航海詩研究·目錄》，頁 4-5。其中海上軍事活動、海外政治交往、海上居民、孤獨感與憶鄉懷闕等議題，皆對筆者歸納唐航海詩書寫類型有所啟發。

⁹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見晉·何晏注，宋·邢昺疏：〈公治長〉，《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42。

¹⁰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卷 86，頁 931。

會的孟浩然（689-740）有〈歲暮海上作〉：「仲尼既云沒，余亦浮于海。昏見斗柄回，方知歲星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為問乘槎人，滄洲復何在。」¹¹

（二）海上生計之苦：多藉海客在鯨鯢齒上、惡波橫天中冒險飛舟的驚心動魄畫面，寫其海上貿易或討海之辛苦，如黃滔（840-911）〈賈客〉：「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¹²又如王建（約 767-約 830）〈海人謠〉：「海人無家海裏住，采珠役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¹³

（三）海上軍事之險：主要以傷悼海上戰士之陣亡、特寫戰艦破浪前進之驚險，來強調海戰比陸戰更為凶險，如唐太宗（599-649）〈傷遼東戰亡〉：「鑿門初奉律，仗戰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翼正凌風。未展六奇術，先虧一簣功。防身豈乏智，殉命有餘忠。」¹⁴又如許敬宗（592-672）〈奉和春日望海〉：「韓夷愆奉贐，憑險亂天常。乃神弘廟略，橫海剪吞航。電野清玄菟，騰笳振白狼。連雲飛巨艦，編石架浮梁。……驚濤含蜃闕，駭浪掩晨光。」¹⁵

（四）送友航行（歸海外或出使）之愁：多藉對友人航程的遙遠、風濤的險惡、海族的威脅等豐富想像，描繪出對友人的憂心與不捨，如王維（701-761）〈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驚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¹⁶、林寬（?-?）〈送人歸日東〉：「滄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來。波翻夜作電，鯨吼晝為雷」¹⁷、顧況（約 727-約 815）〈送從兄使新羅〉：「獨島緣空翠，孤霞上沆寥。……颶風晴汨起，陰火暝潛燒。……夢向愁中積，魂當別處銷」。¹⁸

¹¹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159，頁 1628。

¹²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704，頁 8078。

¹³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298，頁 3383。

¹⁴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1，頁 13。

¹⁵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35，頁 463。

¹⁶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127，頁 1289。

¹⁷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606，頁 7001-7002。

¹⁸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卷 266，頁 2957。

然而，這種「憂」的精神特質，到了宋代航海詩中發生怎樣的轉變？是否如吉川所言呈現出「較富於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的風格？乃筆者接下來所欲探討的重點。影響宋代航海詩人精神內涵的思想氛圍，除了《論語》「乘桴浮於海」、堅持行道的儒家精神外，主要還有逍遙自適的道家精神，與觀心自在的佛教精神，其中尤以因晚唐日僧慧鑊渡海留置「不肯去觀音」像傳說才逐漸發展起來的「普陀山觀音信仰」¹⁹與航海關係最為密切，至宋代普陀山還發展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文人說禪論道亦蔚然成風，例如：與蘇軾相善的文人畫家李公麟繪有「自在觀音」、「長帶觀音」、「石上臥觀音」、「觀世音三十二變」等多幅觀音像，文人受佛教之影響可見一斑。²⁰是以，筆者擬以宋代儒、釋、道兼容並攝的思想氛圍切入，自歷史視角考察宋詩對上述四種唐詩航海之「憂」類型的新變之處，以探知宋詩人面對海上情境時所展現「較富於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精神特質的具體內涵，並進而歸納宋詩航海書寫的藝術風格與特徵。

目前學界針對古典詩「航海書寫」主題進行的研究，多聚焦於唐、明、清詩歌²¹，至於與「宋詩航海書寫」相關的研究，雖有郭慶財〈論宋代海南謫宦的渡海詩〉、王紅杏《宋代涉海韻文研究》、顏智英《宋詩海洋書寫研究》等，但郭文僅論及謫宦渡海詩一類，未及於其他三種航海類型（海上生計、海上軍事、送友航行）²²；王書論

¹⁹ 唐代之前，浙江普陀山所在的舟山群島主要是中國古代傳說和道家敘述中的修道勝地、蓬萊仙境，普陀山從何時開始與觀音說法寶地聯繫在一起，在釋氏典籍與地方史志中有多種記載，學界亦因之形成多種看法，但關於普陀山開基，史籍中流傳最多的為日僧慧鑊留止觀音聖像說，鄒怡根據中外史料的對比，認為慧鑊渡海留像、普陀開基的時間為唐宣宗大中 13 年（859），具體論述可參鄒怡：〈從道家洞天到觀音聖界——中古東亞文化交流背景中的普陀山開基故事〉，《史林》1（2017.2），頁 53-63。至於普陀山開基故事，據南宋羅濬等（寶慶）《四明志》的記載，大致為：日僧慧鑊從五台山得觀音佛像，將奉迎回國，船至普陀山，「濤怒風飛，舟人懼甚」。鑊夜夢胡僧言欲安此山，必令便風相送。鑊遂敬置其像而去，因呼為「不肯去觀音」。詳見宋·羅濬等：〈敘祠〉，《四明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75 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 11，頁 5214 下。

²⁰ 詳參樊波：〈宋代文人畫思潮和李公麟人物畫的審美取向〉，《榮寶齋》4（2006.7），頁 58-59、周燕：〈試談畫家李公麟的生平及其創作〉，《安徽史學通訊》2（1958.5），頁 5。

²¹ 例如：夏燕梅《唐代航海詩研究》、薛順雄〈渡臺悲歌——臺灣傳統詩文中所表露的「渡臺困境」初探〉、李知灝〈蛟鯨宮闕龍伯國——清代游宦文人對臺海的空間想像與渡海書寫〉、廖振富〈清代臺灣古典詩中的渡海經驗〉等。

²² 郭慶財：〈論宋代海南謫宦的渡海詩〉，《中國文學研究》2（2013.4），頁 31-36。

述的範圍又過於廣泛，舉凡宋代與海相關的韻文（詩、詞、賦）皆在討論之列，書中關於航海詩作的分析散見於第三章的各小節中，未見系統性的論述²³；顏書研究主軸在宋詩的「海洋」，而非針對「航海」，因此其中雖有關於北宋詩航海書寫的討論，但僅選取四首詩為代表論詩人以航行所見清朗之景表達欣喜之情，論點雖可資參酌，但研究文本仍嫌不足²⁴；顏書另有專章論述陸游詩的航海書寫與想像，其中對於陸游獵奇與履新詩作雖有深入分析，然僅止於一家航海詩的研究，未能窺見宋詩「航海書寫」的全貌。²⁵由此可見，「宋詩航海書寫」仍存在極大的研究空間。

因此，本論文擬以宋詩中 1400 首左右與「航海書寫」相關的詩作為研究對象，自其中篩選出較具代表性的作品近 50 首，並結合詩人的寫作背景，依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所論唐宋詩風之不同傾向，從歷史視角考察北、南宋詩承唐詩宦途失意之憂、海上生計之苦、海上軍事之險、送友航行之愁等四種航海書寫類型中的新變之處，以具體探究北、南宋詩人面對海上情境時有別於唐詩人「深憂」的精神特質所在，一方面作為理解宋代文人的新取徑，另一方面見出宋詩航海書寫的藝術風格與特徵。

二、「憂」的淡化與超越

（一）北宋詩航海之「憂」的淡化

北宋航海相關詩作由唐的 200 多首急增至 600 多首，其航海之「憂」的內涵雖仍承繼唐人宦途失意之憂、海上生計之苦、海上軍事之險、送友航行之愁等四種類型，但是，由於北宋詩人有較多親海、航海的機會，再加上儒、釋、道兼容並攝的哲學氛圍影響，相對於唐人的航海深「憂」，北宋詩人的航海之「憂」卻呈現出淡化

²³ 王紅杏：《宋代涉海韻文研究》，「第三章」，頁 85-143。

²⁴ 顏智英：《宋詩海洋書寫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28-30。

²⁵ 顏智英：《宋詩海洋書寫研究》，頁 149-208。

的傾向。詩人們不再如唐人細繪海上凶險或航行失方，而多以輕描淡寫海上風濤、海族等威脅，或強調儒之忠信仁義、釋道之曠達等精神特質作為海上安全憑仗的方式，來淡化航海之「憂」。

首先，就宦途失意之憂的淡化言，北宋雖因黨爭激烈之故，詩人輒受政敵陷害而謫宦海邊或海島，然而其不再如唐人借孔子「乘桴浮海」或已航行失方寫其仕途不順、人生茫無定向的深憂，而是憑藉己身之哲學涵養，在航行海上時以大自然的啟發鼓舞或強調一己精神特質的方式來淡化人生逆境所帶來的憂思。前者如哲宗元符 2 年（1099）責授惠州（今廣東省惠州市）別駕、英州（今廣東省英德市）安置的孔平仲（生卒年不詳），其〈寓目〉詩云：

白日照園林，悲風久蕭索。橫秋隻鶻健，駕海孤帆逸。陰雲帶雨歸，晴嶂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²⁶

孔平仲因黨爭而遠謫廣東近海地區。如果以哲宗元祐元年（1086）為界，元祐前他某些政治立場傾向新黨；元祐時期因受舊黨人物提攜，先後以館職提點江浙鑄錢和京西路刑獄公事，是以政治情感上更親近舊黨，尤其在哲宗親政後，新黨將他硬歸入黨附元祐者。²⁷因此，元符元年（1098）知衡州任上被「提舉董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州」²⁸，後徙韶州；翌年 5 月，不幸又「責授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原因為「以元豐末上書詆訕先朝政事……故有是責」²⁹，仍與黨爭有關。孔平仲雖為孔子四十七代孫，但詩中書寫己身駕馭孤帆、漂蕩海上時，卻未以先祖「乘桴浮海」意象呈顯當時因黨爭而致仕途偃蹇之愁，反倒藉眼前秋日孤鶻橫空健飛之勢而寫心之領悟、鼓舞，再以山巒由陰雲排空而出的清景，以及已縱筆高吟以抒解情緒的舉措，隱隱寄寓其謫宦嶺海「怨而不怒」³⁰的孤寂與淡淡的憂思。

²⁶ 宋·孔平仲：《清江三孔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2，頁 447。

²⁷ 張劍：〈孔平仲與新舊黨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2018.1），頁 43-44。

²⁸ 元·脫脫：〈孔平仲傳〉，《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卷 344，頁 10934。

²⁹ 以上二則資料，見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 3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 510，頁 12141。

³⁰ 齊慧源、侯家旭認為孔平仲幾十年宦生涯中，起伏跌宕，仕途不順，只有寄情文學。他長於史學，

後者如徽宗崇寧元年（1102）因正直敢言、被政敵陷害而編管通州、移昌化軍（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的任伯雨（1047？-1119？），其〈述懷〉詩云：

仇人意未厭，窮荒必投斥。轉海僅萬里，艱危備經歷。有時遭颶風，天地如抹漆。雪浪山崩頽，轟厖飛霹靂。扁舟甚桔槔，俯仰顛倒立。雙檣捲欲折，繩斷水蘸席。鯨鱷口垂涎，噴咤煙雨集。萬怪競周章，腥臊助噓吸。平生仗忠信，安敢保瞬息。寅緣脫魚腹，島嶼稍登陟。……雅有江海志，仕宦特牽迫。一日偶遭際，用捨何敢必。但思忠邪分，於國繫休戚。周廢不恤緯，我意何窮極。漆室倚門嘯，我情第堙鬱。嗚呼謀身者，所宜念陰隲。³¹

任伯雨航渡瓊州海峽時，雖因遭遇颶風以致經歷了驚濤駭浪、檣傾楫摧、海族威脅等艱危的海上凶險，但仍憑藉其「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³²的家學淵源所孕育的儒者「忠信」特質，而克服此海上逆境；同時，也正因這股平生仰仗的「忠信」力量，使他置身航海險境時，能夠不顧自身安危、淡化自身謫宦的憂思，而如魯國「漆室女」³³般心心念念的只有國家的存亡。

其次，就海上生計之苦的淡化言，北宋詩人不再如唐人藉海客冒險飛舟寫其海上貿易或討海之辛苦，而改以儒者對海民生命安危的關懷，或以海上遇難卻得道仙救助生還的驚喜，來淡化海客為生計不得不海上涉險的辛苦與深憂。前者如蘇軾（1037-1101）〈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五：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江神河伯兩醺雞，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³⁴

為「怨而不怒」的儒者，選擇了適合自己特點的方式，通過《續世說》的編撰，抒發他的幽憤之情，寄託他無由實現的抱負。參齊慧源、侯家旭：〈從《續世說》看宋代文人孔平仲的儒學情懷〉，《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0（2016.1），頁106。

³¹ 宋·呂祖謙：《宋文鑑》，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54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20，頁65-66。

³² 元·脫脫：〈任伯雨傳〉，《宋史》，卷345，頁10964-10965。

³³ 「其鄰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為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漢·劉向撰，清·王照圓補注，虞思徵點校：《列女傳補注·仁智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頁128。

³⁴ 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0，頁485-486。

狂風巨浪，是海民生命與財產安全的最大威脅。尤其是錢塘海潮，雖極壯觀，卻經常危害當地百姓的生命安全。當海潮來時，氣勢懾人，如范仲淹所云：「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³⁵，弄潮其上，往往有沉沒者，因此，北宋治平年間有杭州郡守蔡襄，先上奏朝廷禁止弄潮，又作〈杭州戒弄潮文〉³⁶；熙寧年間，有兩浙察訪使李承之奏請禁止弄潮。然而，依然無法遏止「吳兒」繼續在凶惡的錢塘潮中手持彩旗、踏浪狎濤，以搏取權貴商賈的賞賜來維持生計。是以通判杭州的蘇軾，在目覩弄潮兒冒險作海上表演以圖蠅頭小利，以及認知海潮將對沿海居民造成生命財產的巨大威脅與損害後，並未用大篇幅文字強調海民的辛苦與危險，而是以儒家仁愛的襟懷，借用海潮神話，發出欲使曬鹽的鹵田能變成可耕的農田，以及欲效吳越王錢鏐「射潮」³⁷以平息錢塘怒潮的雄偉心願，顯現出對百姓安危深深的關切。後者如鄒浩（1060-1111）〈悼陳生〉：

豪商破浪隨東風，輾轉相繼滄溟中。回環極目渺無際，萬石之載裁飄蓬。一朝六鷁不得進，十舟八九成虛空。一舟邂逅脫魚腹，開帆豈暇論西東。大明出沒夜復旦，何許清越鳴晨鐘。舟人側耳正驚喜，忽瞻水際排奇峰。落帆沉碇泊古岸，介然荒徑雲間通。鄞川書生托舟尾，見之踴躍追猿猱。扶疏怪木進十里，突兀古院題天宮。……舉頭指似蓬萊島，霜雪直上磨蒼穹。……書生名利浹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老翁照見輒微笑，血盆再入寧易攻。蓬萊有路爾常覩，此別曠劫無由逢。吾今舟楫助爾往，爾其登覽庶可窮。日輪迎曉傍山出，水聲先沸驚壺隆。赤光散合動天地，頃刻氣候分春冬。高低殿角屹相向，一一鑄鑿非人工。窮晨不復值仙子，卿雲瑞霧空蒙籠。……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仙兮仙兮一何異，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

³⁵ 宋·范仲淹：〈和運使舍人觀潮〉，收入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3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卷167，頁1908。

³⁶ 「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誇。時或沉溺，魂魄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濱。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杭州戒弄潮文〉，《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620。

³⁷ 蘇軾於詩中自註曰：「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

忘情亦歎歎，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紀其事。³⁸

鄒浩，字志完，號道鄉居士，是北宋詩文頗豐的作家，一生宦途坎坷，哲宗朝因論國事而削官、羈管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徽宗朝再謫衡州（今湖南省衡陽縣），尋竄昭州（今廣西省平樂縣），故其有詩云：「三竄湖南與嶺南，生涯破蕩孰能堪？」³⁹鄒浩的詩歌體現了北宋融「禪學、儒學、道學三位一體的思想」⁴⁰，尤其對「道」的體悟尤深，曾云：「真訣由來甚易明，惟人用志不精誠。從今謹事先生語，何患無階朝玉清？」⁴¹因此，當他從友人章潛處聽到欲赴開封應舉的寧波陳生搭海商船遇難，船被風吹至蓬萊峰，遇蓬萊仙人方得生還、遊古天宮院及蓬萊峰，返家後妻子卻早已過世的奇聞後，頗有所感，遂以長詩記錄之並表達其對陳生重名利「塵念」、遇仙卻不求仙的感嘆。詩中對海商大船為生計出海卻遭遇暴風、幾乎全數覆溺的悲慘情狀，僅以「一朝六鷁不得進，十舟八九成虛空」二句予以輕描淡寫；反而用極大的篇幅描述陳生得到蓬萊仙人搭救的幸運過程，此份大難不死的驚喜，大大淡化了海上謀求生計之苦的悲傷意緒。

再次，就海上軍事之險的淡化言，北宋自景德元年（1004）與遼簽訂澶淵之盟，即結束唐末以來契丹政權與中原王朝間長期的軍事衝突，北宋統治者接受疆域現狀，放棄北伐之念，以歲幣換取和平，奠定了安定的大環境⁴²；隨著承平時間的延長，朝中文臣多「目不識干戈之事，耳不聞金革之聲」⁴³，詩中關於海上軍事行動的描寫亦不多見，更遑論如唐詩般傷悼海戰之陣亡戰士或特寫戰艦破浪之驚險，所可見者，泰半為對將領海上戰功的想像或讚美，如梅堯臣（1002-1060）〈送王巡檢之定海〉：

休淬鳴鶴劍，休調鵠血弓。平時自壯大，何所立戰功。得兵不滿百，防寇滄

³⁸ 宋·鄒浩：《道鄉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12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卷2，頁9-11。

³⁹ 宋·鄒浩：〈覽鏡〉，《道鄉集》，卷11，頁5。

⁴⁰ 張福勛：〈鄒浩及其詩論〉，《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93.10），頁55。

⁴¹ 宋·鄒浩：〈有感〉，《道鄉集》，卷12，頁1。

⁴² 方震華：〈從和戎到拓邊——北宋中期對外政策的轉折〉，《新史學》24：2（2013.6），頁39。

⁴³ 宋·石介著，陳植鐸點校：〈三朝聖政錄序〉，《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8，頁209。據陳植鐸考證，本文作於仁宗寶元元年（1038），宋與西夏尚未開戰，見陳植鐸：《石介事跡著作編年》（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82-83。

海東。駕船如飛鷁，出入巨浪中。苟能勇於此，遇敵無廢忠。⁴⁴

北宋的都巡檢使主要職責在募兵禦邊與維護治安，此詩中的主人翁王德用，因英勇善戰、屢建軍功，「善治軍旅」，「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⁴⁵，而使西夏與契丹敬畏三分，並歷任邢、洛、磁、相四州巡檢；慶曆2年（1042）時，契丹欲趁宋夏戰後宋朝元氣大傷時威脅邊境，王德用更加強邊備，令契丹來使以為宋將大舉入侵，遂促成雙方和議達成，戰事並未發生。⁴⁶因此，有宋詩「開山祖師」⁴⁷之譽的梅堯臣於送別王德用詩中，遂藉讚揚德用駕馭巨浪、勇克海寇的軍功想像，以及對其守禦海防、忠於朝廷之期勉，來表達對友人赴定海任職的祝福。孫盼盼曾指出：梅堯臣「送別詩」的特色，在於打破了往日悲傷惆悵的氛圍⁴⁸；今觀梅堯臣〈送王巡檢之定海〉一詩，充滿對友人海上守衛勤政勸勉的積極樂觀之意，完全不見唐詩中描寫海上征戰凶險時的悲傷情調，正可以印證孫氏之語。又如秦觀（1049-1100）〈送孫誠之尉北海〉：

夫子少邁倫，喑鳴阻金石。奏賦明光宮，玉座瞻咫尺。翻身墮雲霄，十載迫窮厄。焚舟更一戰，得尉滄海北。五月乘畫船，簫鼓事遠適。天橫齊山青，雨帶楚水黑。勿云晚方仕，四十乃古昔。勿云名位卑，九萬自此擊。幽求尉朝邑，鬢髮森已白。元振尉通泉，律令非所即。一朝會風雲，顧眄立四極。行矣壯舊圖，勉。⁴⁹

秦觀稱美的對象為同鄉（江蘇高郵）孫勉，勉與兄孫覺（字莘老）、孫覽（字傳師）皆為進士，與蘇軾善，蘇軾有〈送孫勉〉詩，同樣稱其善戰：「君為淮南秀，文采照金殿。胡為事奔走，投筆腰羽箭。更被髯將軍，豪篇來督戰。」並自注：「其兄莘老，

⁴⁴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29，頁1101。

⁴⁵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臺北：自力出版社，1959），卷90，頁569。

⁴⁶ 參元·脫脫：〈王德用傳〉，《宋史》，卷278，頁9466-9469。

⁴⁷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1998），卷174，頁8369。

⁴⁸ 孫盼盼：〈方回《瀛奎律髓》中對梅堯臣「送別詩」的品評〉，《景德鎮學院學報》30：2（2015.4），頁54。

⁴⁹ 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2，頁1371-1372。

以詩寄之，皆言戰事」。⁵⁰秦觀的思想雖兼攝儒釋道三家，但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仍佔主導地位⁵¹，因此，他於詩中詳述孫勉過去焚舟海戰、守衛海疆的忠義與軍功後，更期許他未來能秉此海戰擊敵的豪情締造同樣的壯舉以護國家朝廷，此與唐人憂心海戰之險的觀看視角亦極不同。

最後，就送友航行之愁的淡化言，北宋詩人送友遠航時，不似唐人以想像友人航海的威脅寫其憂心與不捨，而是強調儒、釋、道的精神特質作為海上安全的憑仗以淡化行者內在的憂思。其中，強調儒家精神特質者如蘇轍（1039-1112）〈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學士奉使高麗二首〉：

東夷從古慕中華，萬里梯航今一家。夜靜雙星先渡海，風高八月自還槎。魚龍定亦知忠信，象譯何勞較齒牙。屈指歸來應自笑，手持玉帛賜天涯。

官是蓬萊海上仙，此行聊復看桑田。鯤移鵬徙秋帆健，潮闊天低曉日鮮。平地誰言無嶮阻，仁人何處不安全。但將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詩異域傳。⁵²

高麗在文化上久慕華風，與北宋基本上維持著友好的關係，其間一度因宋遼關係緩和而斷絕，直至神宗熙寧2年（1069）王安石主政後才又恢復交往。上引蘇轍二詩為神宗元豐初年送別林希、安燾奉使高麗之作，思想「以儒為本」⁵³的蘇轍於詩中強調儒者忠、信、仁的精神特質，可使魚龍感動而不致興風作浪，能作為海上安全的憑仗，藉以平復友人林子中、安厚卿出使高麗的恐懼不安。⁵⁴至於強調佛、道精神特質者如：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須竟誰雄。閉門亦勿見，一艤同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

⁵⁰ 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17，頁872。

⁵¹ 張立華：〈秦觀交游考略〉，《石家莊聯合技術職業學院學術研究》2：4（2007.12），頁10。

⁵² 宋·蘇轍：《欒城集》第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8，頁114。

⁵³ 王瑩：〈論蘇氏蜀學的儒學思想〉，《湖北社會科學》8（2010.8），頁117。

⁵⁴ 「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元·脫脫：《宋史·林希傳》，卷343，頁10913。

籠樊顧甚密，俛首姑爾容。眾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蘇轍〈次韻子瞻過海〉)⁵⁵

遊吳興不淺，真欲跨冥鴻。豈畏海波險，自明禪性空。柁樓瞻北斗，帆索張東風。我欲江南去，音書却易通。(郭祥正〈送惠休師浮海如吳〉)⁵⁶

蘇轍與兄蘇軾思想雖以儒為本，但亦調和佛道⁵⁷，因此，當蘇軾將渡海至海南時，本身亦遭貶海康的蘇轍對兄長的抑鬱頗能感同身受，為安慰兄長，不僅「笑揖彼岸人」，還以成佛修仙的曠達來淡化其兄渡海的憂畏：「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只要兄弟二人齊心成為「居家出家人」，或以「老聃」為師，或許終可於佛、道聖地「千佛土」、「兜率宮」相逢。至於郭祥正（1035-1113），元豐4年（1081）通判汀州（今福建省長汀縣），次年攝守漳州（今福建省漳州市），漳州近海，對海洋應不陌生；同時，郭祥正與李白同具有文采風流、蔑視權貴、崇尚自由等特質⁵⁸，被梅堯臣、鄭獬等譽為「李白後身」、「謫仙人」⁵⁹，惜因新舊黨爭影響而政治失意，多半時間過著隱居的生活，因而有濃厚的出世心態與禪、道涵養，上引〈送惠休師浮海如吳〉一詩，即其禪學涵養的體現。詩中不採儒家的價值取向，而勸惠休禪師以「自明禪性空」的佛教修為，來淡化跨海時面對凶險海波的畏懼心理，並以音信易通的樂觀心態送別友人，較唐詩送別渡海時的憂心程度減緩許多。

（二）南宋詩航海之「憂」的超越

由於朝野改崇「元祐之學」（尤其是蘇氏之學）⁶⁰、佛道更加盛行⁶¹、國族危機感

⁵⁵ 宋·蘇轍：《欒城集》第3冊，後集卷2，頁518。

⁵⁶ 宋·郭祥正：《青山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121冊，卷19，頁131。

⁵⁷ 蘇軾：〈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蘇軾詩集》，卷37，頁2015，一詩中寫道：「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言蘇軾兄弟少時主攻儒家經典，同時也旁涉佛道典籍。

⁵⁸ 楊宏：〈郭祥正「謫仙後身」名號由來及內涵〉，《中北大學學報》29：2（2013.4），頁68。

⁵⁹ 詳參梅堯臣〈采石月贈郭功甫〉、鄭獬〈寄郭祥正〉詩。

⁶⁰ 宋·宋孝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收入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5），卷首，頁2。

⁶¹ 「南宋偏安江左，佛教、道教更加盛行，首都臨安（杭州）寺觀林立，皇宮裏經常舉行法會、道場（祈禱、誦經），僧尼、道士出入內廷。」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濟南：齊魯書社，1992），頁128。

濃厚等緣故，南宋詩人反而在航海書寫中能轉換視角，表現出異於唐與北宋詩人的、超越憂懼的精神風貌。

首先，就宦途失意之憂的超越言，南宋詩人或藉由將孔子乘桴之憂轉為觀海之興味以寫超越謫宦之憂的自安自適，或藉由對孔子乘桴浮海卻仍堅持行道的認同以寫超越謫宦之憂的無懼態度與報國精忠。前者如：

三載藤江守藥爐，身輕那復羨飛鳬。瓊山萬里乘風便，始覺驚濤異坦途。出處從今莫問天，南來跨海豈徒然。須知魯叟乘桴興，未似商巖濟巨川。潮回齊唱發船歌，杳渺風帆去若梭。可是胸中未豪壯，更來滄海看鯨波。（李光〈渡海〉三首）⁶²

何人著眼覷征驂，賴有新詩作指南。螺髻層層明晚照，蜃樓隱隱倚晴嵐。仲連蹈海徒虛語，魯叟乘桴亦謾談。爭似澹菴乘興往，銀山千疊酒微酣。（胡銓〈次雷州和朱彥秀才韻時欲渡海〉）⁶³

個性耿直敢言的李光（1078-1159）被秦檜擢用為參知政事後旋即發現秦檜僅欲「藉光名以鎮壓」⁶⁴而已，遂與之決裂，並連上五封劄子毅然求去。紹興 11 年（1141）被貶藤州，紹興 14 年再貶瓊州，〈渡海〉三首即作於渡海赴瓊之際，依序道出其渡海前後面對的憂患與超越憂患的方式：他憑藉著「經史、禪學、道家」⁶⁵的修為，以精神上的自慰自寬、安之若素來超越身心的憂患，先是面對藤州三年以來的羸弱病體，卻將之視為好事，若非「身輕」何能領略瓊海風濤送航的便利？次是面對宦途出處的逆境，卻將孔子「乘桴」之憂轉為觀海之興味，呈顯出超越謫宦之憂的自安自適；最後是以「可是胸中未豪壯，更來滄海看鯨波」言己面對海上鯨波的威脅，

⁶² 宋·李光：《莊簡集》，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5），卷 7，頁 663。

⁶³ 宋·胡銓：《澹庵文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141 冊，卷 3，頁 29。

⁶⁴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長沙：岳麓書社，1992），卷 121，頁 635。

⁶⁵ 宋·李光：〈予三貶而至儋耳，又復二年，平生習氣掃除殆盡。海外去國萬里，士民不知，朝廷事免，議朝政惟是里巷之間，是非曲直偶及之，入於耳中，有如穢物置之寶器。自今客至，惟經史、禪學、道家養生之說乃所樂聞，其餘非已所預者，可付之一默。并成小詩，以述己意云〉，《莊簡集》，卷 7，頁 672。

卻視之為可增加己身豪壯的難得機會，此「雄健」⁶⁶的氣勢暗示其內心仍有「中原正塗炭，生民思息肩」、「輸忠傾肺肝」⁶⁷、「顧九死以猶甘」⁶⁸的報國豪情。至於胡銓（1102-1180），自紹興 8 年（1138）起，即因請斬秦檜而陸續貶福州簽判、編管新州（今廣東省新興縣）、貶吉陽軍（今海南崖縣），直至紹興 25 年（1155）秦檜死後方得以復官。上述胡銓詩，即作於赴吉陽欲渡瓊海之時，他與李光一樣，將孔子「乘桴」之憂轉化為觀海的「興」味，將「乘桴」意象重新賦予逍遙自在的「超越」意義，以表達其樂觀豁達的心境；還進一步糅合晚照晴嵐的明朗意象，以強調其內在精神的清明與灑脫⁶⁹；而詩中援引魯仲連寧可蹈海也不願帝秦的慷慨之典，則更展現出超越逆境的浩然之氣，此應與其自幼隨蕭楚習讀《春秋》，且以《春秋》登甲科的學養有關。⁷⁰後者如李綱（1083-1140）詩：

地角潮來未五更，陰雲解駁作霜晴。星河明潤天容睟，風浪喧騰海氣清。粗見鯤鵬潛化理，豈無犬馬戀軒聲。遠遊不作乘桴計，虛號男兒過此生。（〈次東坡韻二首〉其一）⁷¹

夜半乘潮雲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風。滿天星月光鉞碎，匝海波濤氣象雄。大

⁶⁶ 《宋史》載李光貶謫中，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見元·脫脫：《宋史·李光傳》，卷 363，頁 11342。

⁶⁷ 宋·李光：〈稚山運使作齋名藏暉且覓詩久不能成今茲以大農召行有日因成鄙句並以送行〉，《莊簡集》，卷 1，頁 606。

⁶⁸ 宋·李光：〈瓊州安置謝表〉，《莊簡集》，卷 13，頁 739。

⁶⁹ 胡銓在貶謫文人中展現了少有的自信，曾云：「每念通判兄（李光）七十尚生還鄉里，蘇子卿十九年歸漢，萬里遼東亦歸管寧。犬馬之齒比通判兄少二十年，自戊午被放，及今比李揆多一年，比子卿欠二年，比姜慶初欠三年，比東坡多十年，他不足論也。倘厄運漸滿，如子卿則更二年耳，如慶初則更三年耳，豈可便作死漢看，謂不生還侍下哉？如厄運未滿，更展十年，不然更寬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七十還鄉，有何不可？」見宋·胡銓：〈與振文兄〉，《胡澹庵先生文集》第 2 冊（清道光 13 年讀書堂重刊本），卷 13，頁 10-11，這種樂觀心態在此前的渡海詩人中是極為少見的。

⁷⁰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胡銓師事於蕭楚（子荊），及其「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卷 3，頁 67。又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評價蕭楚云：「後澹庵以孤忠讜論，震耀千秋。則其師弟之于春秋，非徒口講耳受者矣。」見清·黃宗羲：《宋元學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45，頁 683。可見蕭楚治《春秋》特重學以致用的特點，以及對胡銓忠君為國思想的影響力。

⁷¹ 宋·李綱：《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卷 24，頁 318。

舶憑陵真滄渺，寸心感格在精忠。老坡去後何人繼，奇絕斯遊只我同。（〈次地角場俾宗之攝祭伏波廟〉二首）⁷²

李綱於趙構即位之初為相，但僅在相位 75 日，即被覬覦相位的汪伯彥、黃潛善、張浚等人疏劾而罷相落職，輾轉流離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縣）、澧州（今湖南省澧縣）、單州（今山東省單縣），建炎 2 年（1128）更被謫萬安軍（海南島），建炎 3 年 11 月 25 日與子李宗之南渡瓊海⁷³，上引三詩乃其渡瓊前後所作。自幼受到允文允武、進退有度的父親薰陶⁷⁴，孕育出豪邁人格以及對國事責任感的李綱，首先以《莊子》鯤化為鵬的氣勢入詩，喻寫一己直面喧騰風浪的男兒勇氣；接著，對孔子「乘桴」之志的詮解，異於蘇軾、李光等人偏向超脫自在，而如其〈乘桴浮于海賦〉所云：「風浪喧騰，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沒，尚寬寇盜之憂。爰有羈臣，遠投瘴海。短髮白而早衰，寸心丹而不改」⁷⁵，他認同的是孔子對政治信念的執守，儘管被謫浮海，但面對國運的多艱，精忠報國之丹心卻始終不改，有著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毅；而氣象雄偉的波濤，不足以威脅他的心靈，反而成為激發詩人愛國情緒的「異質同構」⁷⁶的物理因素，同時，李綱心裡明白，高宗才即位不久，意欲有所作為，整個朝

⁷² 宋·李綱：《李綱全集》，頁 318。

⁷³ 此詩詩序云：「次地角場，以瘡瘍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祭，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乘潮解桴，星月燦然，風便波平。詰旦已達瓊管，東坡謂『斯遊奇絕冠平生』，非虛語也。作二詩紀之。」

⁷⁴ 李綱父夔，文武兼能，不僅嗜讀書、能賦詩，還曾助呂惠卿抵抗夏人入寇。至於「其教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此外，李夔還教李綱以進退有度，當綱得罪遠謫時，夔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以上資料參見宋·楊時：〈李修撰墓誌銘〉，《楊龜山先生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卷 32，頁 1227。

⁷⁵ 宋·李綱：《李綱全集》，卷 4，頁 21。

⁷⁶ 「異質同構」是由格式塔心理學派所提出的，即指「兩個不同的空間領域具有相似的結構特性。」參〔德〕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著，郭小平、翟燦譯：《藝術心理學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頁 354。亦即，外在世界的力（物理）與內在世界的力（心理）在形式結構上的「異質同構」；它們在大腦中所激起的電脈衝相同，因此能主客協調，物我同一，外在對象與內在情感合拍一致，從而在相映對的對稱、均衡、節奏、韻律、秩序、和諧……中，產生美感愉快。參李澤厚：《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 503-504。因此，就「豪氣」心理的發生言，屬於物理世界的奇壯大海，與屬於心理世界的愛國豪氣，雖然質料及品位皆不同，但兩者間的表現性及其力的結構卻存在著同型契合的關係，此即客觀世界與心靈間「異質同構」的對

延情勢並非完全無可為，因此，詩中仍充滿著詩人的豪情壯志。

其次，就海上生計之苦的超越言，南宋詩人以更積極的出航準備（祈風）、勇氣，以及轉換欣賞的角度看待海上生活，來超越因蹈海營生的危險、辛苦而產生的深憂，如王十朋（1112-1171）〈提舉延福祈風道中有作次韻〉：

雨初欲乞下俄沛，風不待祈來已薰。瑞氣遙看騰紫帽，豐年行見割黃雲。大商航海蹈萬死，遠物輸官被八垠。賴有舶臺賢使者，端能薄斂體吾君。⁷⁷

兩宋政府大力推行海洋貿易政策，北宋於廣州、泉州、明州、杭州皆設有市舶司，南宋高宗更於江陰、溫州增設市舶司；海外貿易為大利所在，連皇帝都親自過問，南宋高宗曾云：「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阜通貨賄。」⁷⁸南宋孝宗隆興2年（1164）更為了縮短海船航行周期，增加市舶收入而設立「饒稅制」：「若在五月內回舶，與優饒抽稅；如滿一年內，不在饒稅之限，滿一年已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⁷⁹因此，海商為求能及時返回以免徵重稅，只得冒「萬死」之險航行大海中；然而，時知泉州、愛民如子的詩人王十朋⁸⁰，卻以積極的視角，強調海商經略遠貨的活躍與征服海洋的勇氣，以及提舶為海商祈風、體恤海商薄徵賦稅的賢明舉措，來取代書寫海商蹈海營生之艱的視角，翻轉了前人的憂傷情調。又如楊萬里（1127-1206）〈蟹戶〉：

天公分付水生涯，從小教它踏浪花。煮蟹當糧哪識米，緝蕉為布不須紗。夜來春漲吞沙觜，急遣兒童斫荻芽。自笑平生老行路，銀山堆裏正浮家。⁸¹

長期水居的蟹民，散居在廣東、廣西、海南、福建、浙江等沿海，一直以來受到統

應。

⁷⁷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卷26，頁500。

⁷⁸ 清·徐松：〈職官四十四之二十四〉，《宋會要輯稿》第7冊（臺北：世界書局，1964），卷1124，頁2275。

⁷⁹ 清·徐松：〈職官四十四之二十七〉，《宋會要輯稿》第7冊，頁3377。

⁸⁰ 王十朋乾道元年（1165）八月起知泉州，任內重視農田水利，愛民如子，乾道六年閏五月，泉州任滿之日，「老稚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見元·脫脫：《宋史·王十朋傳》，卷387，頁11886-11887。

⁸¹ 宋·楊萬里：《誠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16，頁410-411。

治者的歧視，不許陸居、不可列戶籍，宋代時才被命名為「蜑」。⁸²他們起居皆在舟上，蘇軾有詩道：「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⁸³，生活上經常要忍受避雨移浦及與魚蝦、雞犬共眠的不便；再加上以捕撈海物為生、收入極不穩定，捕撈技術落後、漁獲極少，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不等價交換的盤剝，青壯勞力的非正常死亡率高，自然災害的侵襲等因素，因此，其生計極其貧困，許多人長期處於赤貧的境地。⁸⁴但在廣東任官的詩人楊萬里，卻以歌頌蜑民淡而有味的海上生活之樂，取代悲憫其生活困苦的书寫：蜑民以荻芽搭配魚蟹為主食，自緝芭蕉纖維為衣，以美麗的銀山浮浪為行住所在。全詩情調輕快，展現出詩人對蜑民水上浪漫生活的欣賞，也傳達了楊萬里貧而不憂⁸⁵、「以窮為亨」⁸⁶、以微笑幽默超越生活苦難的生命哲學。

再次，就海上軍事之險的超越言，南宋詩人主要以「我」直面風浪的決心，展現為國犧牲或除奸的勇氣與丹心，這類的詩例多集中在書寫祥興 2 年（1279）宋元崖海戰役上，如陳格（？-1279）〈崖山六詠〉其一：

戰艦衝風起怒濤，北船曉挫暮猶多。強胡難滿吞天慾，志士橫罹伏海號。一劍掛腰隨我去，萬方引領奈君何。⁸⁷

時任南宋海船鹵簿的陳格，正與奉命提督領南海路兵馬的堂兄陳植共同保衛帝昀。陳植的胞姐陳碧娘有詩云：「植兮再吸傾六罐，格也一彈落雙燕」⁸⁸，以植之能飲與格之善射美其皆英豪能士。祥興 2 年 2 月，陳格隨堂姐夫張達率軍夜襲元軍在崖山的大營，不幸陣亡，於出發前作此詩，並自注：「殉難前夕作」，可見已抱殉國之決

⁸² 詹堅固：〈宋代蜑民考略〉，《黑龍江社會科學》5（2012.10），頁 147。

⁸³ 宋·蘇軾：〈連雨江漲二首〉其一，《蘇軾詩集》，卷 39，頁 2120。

⁸⁴ 詳參詹堅固：〈宋代蜑民考略〉，頁 149-150。

⁸⁵ 葛天民〈寄楊誠齋〉：「但知拼得忍飢七十年，脊梁如鐵心如石」；趙蕃〈次韻楊廷秀太和萬安道中所寄七首〉之二：「愛竹知人憶故山，食貧過午尚懸簞。」分見《全宋詩》第 51 冊，卷 2725，頁 32063、第 49 冊，卷 2637，頁 30830。

⁸⁶ 「以窮為亨」，出自《誠齋易傳》之「否卦」，初六卦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楊萬里釋云：「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見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卷 4，頁 37。

⁸⁷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63 冊，卷 3338，頁 39861。

⁸⁸ 宋·陳碧娘：〈平元曲寄二弟植與格〉，收入《全宋詩》第 63 冊，卷 3338，頁 39860。

心。詩中痛陳元人之慾永無止境，也悲傷同僚志士於海戰中的慘烈犧牲⁸⁹；但詩人並不畏懼海上軍事行動的凶險，反而以「一劍掛腰隨我去」的豪情與勇氣，直面風浪與凶險，展現殉國的丹心。又如文天祥（1236-1282）〈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曰〉：

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屍漂血洋水渾。……
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煙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⁹⁰

文天祥 40 歲（德祐元年，1275）時即奉詔勤王，翌年奉命出使皋亭山（浙江省杭州市北）元營第一次談判卻被俘，幸能逃脫，由海路南歸行朝；但祥興元年（1278）至五坡嶺（廣東省海豐縣北）第二次與元談判被俘後，即無法脫身，且在元人海船中被迫目睹南宋滅亡於崖海，本詩即為其目睹此軍事行動的血淚實錄。他雖然描寫海戰時「一朝天昏風雨惡，炮火雷飛箭星落」的激烈戰況，宋軍「流屍漂血洋水渾」的大敗慘狀，以及自己「雨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的痛苦抑鬱，但是，天祥並不畏戰，詩末直指導致宋室覆滅的最大罪人，實為腰纏黃金卻怯戰投敵的佞臣們，因此，「我欲借劍斬佞臣」，便是他最深切的怒吼與心願，此等為國除奸的義憤，大大超越了唐人對海上軍事凶險之深憂。可惜，張弘範等元軍防伺甚嚴，天祥無法得遂其志，而後他又由海道被押至北都囚囚三年，始得從容就義，求仁得仁。

最後，就送友航行之愁的超越言，南宋詩人不再強調海程的遙遠或海上的種種威脅，反倒以心念的轉換來送別謫宦之友，以波平及友人平安到家的想像來送別歸鄉之友。送別謫宦友人之詩如李光〈次韻趙丞相海鳴〉：

幽人一枕夢魂清，風鼓寒潮夜有聲。海色天容本澄靜，年來應為不平鳴。身如一葉任風飄，閉眼觀心路匪遙。慣聽海鳴還熟寢，未妨歸夢趁回潮。⁹¹

趙鼎（1085-1147）為南宋高宗時的宰相，與李綱、胡銓、李光並稱「南宋四名臣」，紹興 4 年（1134）以來，因秦檜陷害而陸續貶泉州、潮州，再貶至海南島吉陽軍，

⁸⁹ 「浮尸出於海十餘萬人。」元·脫脫：《宋史·瀛國公紀》，卷 47，頁 945。

⁹⁰ 宋·文天祥：《指南後錄》，收入《文文山全集》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56），卷 14，頁 349。

⁹¹ 宋·李光：《莊簡集》，卷 7，頁 666。

其友李光在送別渡海至海南時，詩中不言海程遙遠或海物威脅，反倒以「海色天容本澄靜」與「閉眼觀心路匪遙」來化解友人的煩憂。佛教的「閉眼觀心」，即《維摩經玄疏》：「觀心因緣所生一切法，心空則一切法空。」⁹²亦蘇軾所謂：「閉眼觀心如止水，水中照見萬象空」⁹³，觀心以見萬象皆空，能使內在得到安寧，由此佛教轉念之法，李光領悟到：「當年有離憂，政以南北故。舉足皆道場，意適隨所遇」⁹⁴，遂以此寬慰欲渡海南的友人趙鼎，藉澄靜海色的陪襯，勸慰趙鼎以「閉眼觀心」之法治心，能超越大海阻隔的煩惱，將覺海路不遠、畏途無多。又如范成大（1126-1193）〈戲答澹菴小偈〉：

莫問前程事，漂然海上舟。命乖逢鬼國，緣合遇蓬丘。畢竟非身計，俱成錯路頭。故鄉隨腳是，流浪不知休。⁹⁵

紹興 18 年（1148）胡銓再貶吉陽軍，「喜佛老，善文章」⁹⁶的范成大以「故鄉隨腳是」勸其友轉換念頭以超越渡海的謫宦之苦，一如蘇軾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⁹⁷，但凡心念所安，無處不可為故鄉。另，送友歸鄉之詩如：

歸路番禺遠，蠻鄉島嶼經。天黃春有瘴，海黑夜無星。北帖船中看，南歌枕上聽。遙知到家日，蜩響荔枝青。（林昉〈送秀才歸南海〉）⁹⁸

湖山快唫覽，勝跡恒追求。合并惜未久，又理東歸舟。揚帆渡鯨浪，帖帖如安流。慙慙不忍別，繾綣難為留。臨風極遐睎，目斷扶桑陬。他時託芳字，還能寄余不。（鍾唐傑〈送僧還日本〉）⁹⁹

海程的諸多威脅，一向為唐、北宋送友遠航詩的書寫主軸，但在南宋詩中卻少見這

⁹² 隋·智顗：《維摩經玄疏》，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3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4，頁 544。

⁹³ 宋·蘇軾：〈王鞏清虛堂〉，《蘇軾詩集》，卷 19，頁 964。

⁹⁴ 宋·李光：〈簽判黃元功公廨枕江有小亭……以見意〉，《莊簡集》，卷 1，頁 609。

⁹⁵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4，頁 23。

⁹⁶ 宋·黃震：〈讀范石湖集〉，收入湛之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51。

⁹⁷ 宋·蘇軾著，薛瑞生箋證：〈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卷 3，頁 488。

⁹⁸ 佚名：《詩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0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368。

⁹⁹ 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09 冊，卷 66，頁 314。

類海上凶險的描寫，取而代之的是如林昉、鍾唐傑送別詩中「北帖船中看，南歌枕上聽」、「揚帆渡鯨浪，帖帖如安流」的波平想像，以及對友人「遙知到家日，蝸響荔枝青」平安到家的祝願，藉以超越對友航行的憂心與不捨。林昉，粵（今廣東）人，宋亡不仕，與汪元量有交情，同為南宋遺民；鍾唐傑，萍鄉（今屬江西）人，朱熹弟子，曾問朱熹：「窮理持敬」，曰：「此事不用商量。若商量，持敬便不成持敬；若商量，窮理便不成窮理。須令實理在題目之後。」¹⁰⁰南宋詩人在此理學的理性思維下，再加上國族的危機感始終縈繞心頭，那麼，海洋的風濤與海族所造成的威脅感已相對的不足為患了。

三、「喜」的新拓與多樣化

（一）北宋詩航海之「喜」的新拓

除了航海之憂的淡化外，北宋航海詩的精神內涵還新增了詩人的航行之喜，這份喜悅，主要為謫歸之喜，但在詩人們不同的遭際與學養下，其謫歸的喜悅中又各自呈顯著個人獨具的精神風貌。例如釋惠洪（1071-1128）〈渡海〉透顯出他在僧俗間流轉變化的歷程：

萬里來償債，三年墮瘴鄉。逃禪解羊負，破律醉檳榔。瘦盡聲音在，病殘鬚鬢荒。餘生實天幸，今日上歸艎。¹⁰¹

釋惠洪生於江西筠州，崇寧元年（1102）至金陵清涼寺為住持後，漸與政壇人物張商英、郭天信等熟稔；政和元年（1111），黨爭事發，張商英被罷相，郭天信亦得罪，惠洪受張、郭牽連而被勒令還俗，發配朱崖（今海南省海口市），三年後始得北歸，遂作此詩誌慶。「亦僧亦俗」¹⁰²的詩僧釋惠洪於詩中表示，他初貶海南時以佛教「償

¹⁰⁰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下冊（京都：中文書局，1984），卷120，頁1306。

¹⁰¹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卷9，頁9。

¹⁰² 孫海洋：〈來來往往一首詩，禪俗兩不離——論釋惠洪及其詩歌創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6（2004.11），頁77。

還前世債」的業報輪迴思想作為面對生命困境的精神力量；但在長達三年的流寓生活中，卻又選擇以「逃禪」、「破戒」等食色之欲排遣「墮瘴鄉」的苦悶¹⁰³，一如其所宣稱：「道人何故，姪坊酒肆。我自調心，非干汝事」¹⁰⁴，並將這些書寫世俗之情的內容稱作「文字禪」；然而，這種「在欲行禪」的方式帶給他的卻只是暫時的解脫與快意，入世過深的結果，遂逐漸產生了「生命孤寂感和荒蕪感」¹⁰⁵，以致形體消瘦「瘦」、老「病」身「殘」。因此，當政和3年5月得知可「上歸鯨」的獲赦消息時，便深深感到「天幸」的喜悅。值得深究的是，釋惠洪在慶幸之餘，如何看待這個得來不易的「天幸」？他在北歸之後曾說：「予為沙門，乃不遵佛語，與王公貴人游，竟坐極刑，遠竄海外。既幸生還，冠巾說法，若可憫笑。然予之志，蓋求出情法者。法既出情，則成敗讚毀，道俗像服，皆吾精進之光也。」¹⁰⁶可知他在僧俗間流轉之後，終究省悟「不遵佛語」之弊，而選擇回歸至對佛禪的追求與精進。

至於蘇軾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則於北歸的喜悅中，透顯其對政治理想的堅持：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¹⁰⁷

雨後放晴、雲散月明，蘇軾巧妙地運用北歸時海上景致由逆轉順的變化來暗示其由

¹⁰³ 釋惠洪在海南的食色之欲，除了詩中提及的「醉檳榔」外，還有：「乞橄欖於旁舍，判荔枝於沙岸」（〈送李仲元寄超然序〉，《石門文字禪》，卷23，頁18）、「口腹平生厭事治，上林珍果亦嘗之。天公見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喫荔枝」（〈初至崖州喫荔枝〉，卷16，頁13）表現對橄欖、荔枝的食欲；又「日作東坡羹。有佳客至，饌山谷豆腐以餉之」（〈送李仲元寄超然序〉，卷23，頁18）、「分外濃甘黃竹筍，自然微苦紫藤心。東坡鑊內相容攝，乞與饞禪掉舌尋」（〈東坡羹〉，卷16，頁15）表現對東坡羹的食欲；又「一篇引一杯，舉杯揖黎母」（〈己卯歲除夜大醉〉，卷5，頁2）、「蘭叢聚貴客，花輪環侍兒。三盃吾徑醉，四座汝為誰。但覺眩紅碧，了不聞歌吹。翩然上馬去，海月解相隨」（〈楊文中將北渡何武翼出妓作會文中清狂不喜武人徑飲三盃不揖坐客馬上馳去索詩送行作此〉，卷9，頁9）表現對酒、色的欲望。

¹⁰⁴ 宋·釋惠洪：〈政和二年前謫海外館瓊州開元寺儼師院遇其遊行市井宴坐靜室作務時恐緣差失念作日用偈八首〉其三，《石門文字禪》，卷17，頁18。

¹⁰⁵ 曹艷貞、張學松：〈釋惠洪海南流寓心態變遷〉，《學術研究》3（2018.3），頁172。

¹⁰⁶ 宋·釋惠洪原著，林伯謙、陳弘學編著：《標點注釋智證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卷10，頁298。

¹⁰⁷ 宋·蘇軾：《蘇軾詩集》，卷43，頁2366。

南荒得以北歸中原、由苦轉喜的心境轉折。謫放海南三年¹⁰⁸，北歸中原對他而言固然值得慶幸，但貶謫南荒亦不盡然全屬不幸：「空餘魯叟乘桴意」，表面上看似藉反用孔子「乘桴」之憂表達得以北歸的喜悅，不必再如孔子道不行於中原而憂愁；實質上「空餘」二字，卻賦予「乘桴」更深一層的含義，透顯出蘇軾原欲效法孔子繼續行道於九夷、堅持政治理想之本意。¹⁰⁹回顧三年來蘇軾於海南「絃歌滄海濱」¹¹⁰的作為——自編詩書禮樂等教材，敷揚文教，使多士崛起、教化日興，正是孔子這種濟世精神與理想的發揚與實踐。若再結合詩末「不恨」、「奇絕」之語，更可見出蘇軾能轉換思維，運用道家的超然與禪宗的智慧，超越生命的苦難，以欣賞「奇絕」海景的豁達心態，代替貶謫南荒的不幸心理。這種融和了堅持與超脫的獨特貶謫精神¹¹¹，既得自於他本身的人生智慧，也獲益於北宋儒、釋、道兼容並攝的哲學思想與文化內蘊。¹¹²

（二）南宋詩航海之「喜」的多樣化

¹⁰⁸ 哲宗親政，重新起用新黨，幾乎罷黜太后信用的舊臣；紹聖元年（1094），蘇軾也以譏刺先朝的罪名貶官惠州，紹聖4年（1097）再貶儋耳。元符3年（1100）正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繼位，宋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身份處理軍國大事，原來被貶的元祐黨人，已死的追復原官，未死的都遷回內郡居住；65歲高齡的蘇軾亦於5月內遷廉州（州治在今廣西省合浦縣）。

¹⁰⁹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邢昺釋云：「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楫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己道也。」見晉·何晏注，宋·邢昺疏：《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頁42。劉寶楠亦云：「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為行道。」見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301。皆認為孔子因己之善道無法施行於現實世界，只好將其人生态理想寄託於浩渺未知的「勃海」之東。可見，孔子乘桴，不僅有己不為世用、仕途不順之憂，更有仍堅持對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

¹¹⁰ 宋·蘇軾：〈和陶示周掾祖謝〉，《蘇軾詩集》，卷41，頁2254。

¹¹¹ 姚惠蘭提及貶謫文學的源流時指出：從屈原到劉禹錫，大抵走的是「憤」或「怨」的道路。白居易雖以遁迹佛老而得解脫和超越，但其關注的仍是個體生命，表現出來的是虛無意識。只有到了蘇軾，才將超越苦難的曠達與儒家的「樂生」精神融而為一。參姚惠蘭：〈論宋代貶謫文人的海南詞〉，《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4：1（2006.3），頁58-59。

¹¹² 宋代理學的特點是以儒為主，融化釋、道。參張瑞君：《楊萬里評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頁290。同樣地，蘇軾的哲學也呈現出整合儒、釋、道後的博大氣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那種「性命自得」的自由精神境界，亦即秦觀所稱道的：「蘇氏之道，最深於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於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答傅彬老簡〉，《淮海集箋注》中冊，卷30，頁981。

如前所述，北宋詩人新增了航海之喜的書寫，主要聚焦於謫歸之喜的內涵。及至南宋，更因詩人們親海性的提昇、出海動機的多樣化，其航海之喜書寫的精神內涵愈發豐富且具變化，除了謫歸之喜外，還有獵奇之樂、扈從航海之豪、履新之昂揚等新增的精神內涵。茲分述如下：

1、謫歸之喜

南宋海南謫宦中寫謫歸渡海之喜的詩人，主要有折彥質與李綱二人。他們在詩中皆以南渡時之驚濤對比北歸時之安穩，來鮮明烘托出得以北歸中原的喜悅，但又因各自遭際與學養的不同而呈顯著個人獨特的精神風貌。例如折彥質（約 1080-1160）〈北歸渡海〉顯現的是對報效朝廷的期盼：

去日驚濤遠拍天，飛廉幾覆逐臣船。歸舟陡頓能安穩，便覺君恩更煥然。¹¹³

「才兼文武」¹¹⁴的折彥質，曾多次與金兵血戰，被擢升河北河東宣撫副使。靖康元年（1126），金人長驅南下，他以宣撫副使領兵十二萬守黃河，還來不及交戰，軟弱的宋師即潰，彥質因此責授海州團練副使，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安置¹¹⁵；建炎元年（1127）6月再「責授散官，昌化軍（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¹¹⁶謫居海南長達 5 年的折彥質，報國之志未曾泯滅，有詩云：「流離死窮荒，志士氣益塞」¹¹⁷、「回首不堪東北望，桂林萬里是秦關」¹¹⁸，因此，當紹興 2 年（1132）彥質接到得以北返的消息後，於〈北歸渡海〉詩中，除了強調昔日南渡時幾覆其船的驚濤以對比如今得以順利北歸的安穩外，還特別感念「煥然」的「君恩」，隱隱暗示詩人對國君能再給已報國守邊機會的期盼，以及內在深深的國族危機感。

¹¹³ 宋·王象之：〈廣南西路·昌化軍〉，《輿地紀勝》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125，頁 3604。

¹¹⁴ 韓蔭晟謂折彥質：「振七世之家聲，為折氏之冠冕。才兼文武，心存江山。廣交遊，所知多一時賢臣名士。」見韓蔭晟：〈補《宋史·折彥質傳》〉，《寧夏社會科學》5（1993.10），頁 81。

¹¹⁵ 元·脫脫：《宋史·欽宗紀》，卷 23，頁 432。

¹¹⁶ 宋·李綱：〈建炎時政記中〉，《李綱全集》，卷 179，頁 1664。

¹¹⁷ 宋·折彥質：〈寇萊公廟〉其一，收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廣南西路·雷州》第 4 冊，卷 125，頁 3464。

¹¹⁸ 宋·折彥質：《葆真居士集·超然亭》，收入宋·陳思編，元·陳世隆補：《兩宋名賢小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3 冊，卷 180，頁 471。

至於李綱〈北歸晝渡海，風便波平，尤覺奇絕，成五絕句〉詩，則於北歸的喜悅中透顯其對天地大全的圓融觀照：

澄波不動琉璃滑，一望應須萬里餘。舟行衝激浪花碎，如馭白雲遊碧虛。去得南風來北風，神靈只在指呼中。老坡有語舊曾記，信吾人阨非天窮。來時風浪夜喧驚，歸去潮波枕席平。非是波神有分別，故教清晝看寰瀛。纖雲肆捲日方中，海色天光上下同。身在琉璃光合裏，碧空涵水水涵空。平生奔走畏江湖，暮齒來乘海上桴。自哂井蛙真見小，望洋向若一廬胡。¹¹⁹

詩中除了承蘇軾以海天一色的清光海景傳達北歸之喜外，還特意以南渡時的驚濤對比北歸時的波平舟穩來表現宦途的由蹇轉順；同時，也承蘇軾以孔子「乘桴」之典表達對堅持政治理想的認同。不同的是，蘇軾以所見大海的奇絕美景而發出「九死南荒吾不恨」的豁達；而建炎3年（1129）被貶海南3日即遇赦的李綱則藉《莊子·秋水》河伯望洋興嘆的寓言，以及其所見「碧空涵水水涵空」的天地大全，展現出較蘇軾的「不恨」更加圓融、平和與自在的心理，此與其深受程頤之學的薰陶有關，曾云：「進而在朝，則樂行其道；退而在野，則樂遂其志。窮通不同，而所樂非窮通，則中有所養，而外物不足以移之也。」¹²⁰無論進或退，都能不受外物所移，因此，不管身處何地，李綱內心始終能保持安順的狀態，達致「進退皆樂」的精神境界。

2、獵奇之樂

南宋詩人或因罷官退居濱海家鄉，或因從海路南歸朝廷，故而有更多機會漫遊海上、邂逅種種海洋奇觀。他們往往藉由神話、傳說馳聘其想像，並融入一己形象的描繪，書寫海上獵奇的滿足感與超脫塵世的逍遙之想，如陸游（1125-1210）〈航海〉：

我老臥丘園，百事習慵惰。惟有汗漫遊，未語意先可。或挂風半帆，或貯雲一舸，趁潮亂鳴榔，過磧細扶柁，近輒凌煙海，自笑一何果。邂逅得奇觀，造

¹¹⁹ 宋·李綱：《李綱全集》，卷24，頁320-321。

¹²⁰ 宋·李綱：〈毗陵張氏重修養素亭記〉，《李綱全集》，卷133，頁1285。「中有所養」，即中和工夫：未發為中，已發為和，發而皆能中節，乃程頤學派藉《周易·坤卦·文言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闡發的工夫。

物豈付我？古湫石蜿蜒，孤島松磊砢。雁蕩大龍湫石如騰龍。東海縣境有巨松，傳為堯舜時物。湘竹閼娥祠，淮怪深禹鑠，鬼神駭犀炬，天地赫龍火。瑰奇窮萬變，鯤鵬尚么麼。紛紜旋或忘，追記今亦頗。作詩配齊諧，發子笑齒瑳。¹²¹

此詩為陸游在寧宗嘉泰 3 年（1203）四度罷官後回家鄉越州山陰（今浙江省紹興縣）所作，時年 79。陸游一貫堅持對金人作戰，但南宋統治集團為主和派所把持，使其仕途一再受挫。閒居在家的陸游，經常於家鄉附近泛海獵奇，「趁潮亂鳴榔，過磧細扶柁」，細繪出詩人探奇航行時的忙碌與興致。想像力豐富的陸游，將沿岸所見雁蕩山的大湫石想像為騰躍的大龍、東海縣孤島上的巨松為堯舜以來的古物，將岸邊曹娥祠與舜之二「湘妃」¹²²連結，將水中生物與被大禹鎖頸的淮水水怪「無支祁」¹²³類比，這些神話與志怪的想像暗示了詩人閒退家鄉、欲超脫現實的逍遙之想。詩末，進一步描繪詩人已身舉火觀賞海族的動作，猶如晉溫嶠燃犀角照看各種異狀的水族一樣冒險而刺激¹²⁴，這種獵奇的滿足感，連《莊子》鯤化為鵬的傳說都遠遠無法相比，為其罷官閒居家鄉的生活增添不少樂趣。

又如文天祥〈出海〉二首：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扁舟了無礙，分明便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玉空明，便似乘槎上太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遊奇絕冠平生。¹²⁵

此詩作於恭帝德祐 2 年（1276）文天祥於鎮江北營脫逃後，輾轉迴避元兵、終得出

¹²¹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 54，頁 3196。

¹²² 「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盡斑。」晉·張華：《博物志》，收入陳文新編著：《六朝小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卷 8，頁 265。「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宮、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歿葬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班班然。」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第 1076 冊，卷上，頁 281。

¹²³ 宋·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地記》：「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止桐栢山，乃獲渦水神『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形若獼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禹授之庚申，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從淮之陰鎖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於海。」見宋·李昉：《太平御覽》，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902 冊，卷 882，頁 602。

¹²⁴ 「晉溫嶠至牛渚磯，聞水底有音樂之聲，水深不可測。傳言下多怪物，乃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耶？』嶠甚惡之，未幾卒。」南朝宋·劉敬叔：《異苑》，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第 1070 冊，卷 7，頁 305。

¹²⁵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指南錄》，卷 13，頁 343。

海，從海路南歸永嘉行朝之際。首次出海的文天祥，親睹「極目皆水，水外惟天」¹²⁶的「水天一色」的奇美海景，遂妙用「水晶盤」、「青天作護闌」等尖新的意象書寫大海的空明遼闊，從中透顯出詩人遨遊大海的獵奇之樂；同時，還以一己乘扁舟的自在「無礙」形象傳達其甫脫虎口的暢快。接著，更以張華《博物志》中能「乘槎」直上天界探險的無名英雄自比¹²⁷，興寄其掙脫現實憂患而自在遨遊天際的想望。

3、扈從航海之豪

扈從皇帝航海，也是南宋詩人出海的原因之一。由於皇帝為九五之尊，出海航行亦需講究排場，因而詩中多以巨濤搭配天子巡海的盛大排場以呈現雄壯豪邁的氣象，如李正民（約 1131 前後在世）〈扈從航海〉：

雲濤雪浪蹙天浮，隱隱征帆去未休。蛟蜃伏藏舟楫穩，將軍何用說防秋。¹²⁸

李正民，高宗時官至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建炎 3 年（1129）己酉 7 月，高宗在金陵，聞金兵深入，遂趨平江，歷越州（會稽）、明州（寧波）。12 月乘舟航海，避兵台、溫之間，此時李正民以中書舍人從行，按日記駐蹕之所，成《己酉航海記》一卷，同時有〈扈從航海〉一詩。詩中以際天高浪、眾多征帆襯托皇帝航海的壯盛氣勢；再以海族躲藏、舟行穩健的航行順境，人與海的對立書寫，展現出突破以往的征服海洋的意識，也呈顯出詩人扈從皇帝航海的健旺精神。然而，對堅定主戰、力圖中興的李正民言¹²⁹，詩末「將軍何用說防秋」句，雖以反詰語氣強調對國家邊防的自信與忠君愛國的赤忱，但也巧妙地運用反語手法，「幽微含蓄地流露出對高宗

¹²⁶ 宋·文天祥：〈出海·序〉，《文文山全集·指南錄》，卷 13，頁 343。

¹²⁷ 「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返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芒芒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多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晉·張華：《博物志》，收入陳文新編著：《六朝小說》，頁 42。

¹²⁸ 宋·李正民：〈扈從航海〉，《大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3 冊，卷 10，頁 112。

¹²⁹ 「（建炎三年十一月）是日，知臨安府康允之言：『有歸朝官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進，已自采石濟江。』朝廷以未得杜充、周望報，大懼，詔侍從議之。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汪藻、中書舍人李正民議移蹕平江，親督諸將拒敵，緩急則登海舟避之。」宋·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673。

浮海避敵行為的諷刺」。¹³⁰

又如沈與求（1086-1137）〈扈御舟泊錢清江口值雨〉其二：

法駕親巡海上還，鉤陳萬騎列江干。潮生風熟樓船過，雨助洪濤失故灘。¹³¹

與李正民同為主戰派成員的沈與求¹³²，紹興 4 年（1134）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5 年，兼權知樞密院事；7 年，隨高宗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卒於是年。上引沈與求詩作，極可能作於這段詩人受到高宗重用的時期。自靖康之難後，高宗趙構為避金人追殺，即輾轉於建康、紹興、海上及臨安（杭州）之間，直至紹興 8 年始正式定都於臨安，期間數度泊御舟於錢清江口，詩中以「洪濤」、「鉤陳萬騎」書寫高宗親巡海上巨浪洶湧、防衛儀仗森嚴眾多的盛大氣勢；再以「潮生風熟樓船過」的航行順境，展現詩人扈從皇帝航海的豪情。但對積極主戰的沈與求而言，詩末「雨助洪濤失故灘」之語，應是有意地借景物來暗示其內心對於失去中原故土的激憤與無奈。

4、履新之昂揚

南宋詩人由海道赴任新職，往往以乘風破浪、臨危不驚的豪邁行動暗示其欲一展抱負的雄心壯志或曠達無畏的生命智慧。如陸游（1125-1210）〈航海〉以己臨危不驚抒寫壯志：

我不如列子，神遊御天風。尚應似安石，悠然雲海中。臥看十幅蒲，彎彎若張弓。潮來湧銀山，忽復磨青銅。飢鶻掠船舷，大魚舞虛空。流落何足道，豪氣蕩肺胸。歌罷海動色，詩成天改容。行矣跨鵬背，弭節蓬萊宮。¹³³

¹³⁰ 鹿政：《南宋李正民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中國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9），頁 29。

¹³¹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第 29 冊，卷 1677，頁 18789。

¹³² 「（紹興）四年，出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曰：『今日親征，皆由聖斷。』上意決親征，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己通和。今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上曰：『當如此措置。』」元·脫脫：《宋史·沈與求傳》，卷 372，頁 11542-11543。

¹³³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 1，頁 35。

高宗紹興 29 年（1159），陸游由寧德縣主簿調為福州郡決曹（主刑法之佐使），此詩即作於其赴任新職途中。躊躇滿志的陸游，此時「豪氣蕩肺腑」，如謝安般不為湧浪所驚¹³⁴，故能「歌罷海動色」、「詩成天改容」，展現出臨危不驚的過人勇氣與堅強個性，並以己「跨鵬背」飛至蓬萊仙宮的想像，暗示其實現政治理想的壯志。下列二詩，更藉回憶其此時乘風破浪、穩駕巨舟的豪邁與穩健寫己報國的雄心：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丈夫等一死，滅賊報國讎。¹³⁵

行年三十憶南遊，穩駕滄溟萬斛舟。常記早秋雷雨霽，柁師指點說流求。¹³⁶

二詩皆為陸游回憶 35 歲時赴福州任、初次航行巨海所作。前者作於淳熙 3 年（1176），時陸游被范成大辟為參議官，但無法至南鄭前線殺敵，只能在成都過著飲酒頹放的生活，因而憶起初次航行巨海時，遇銀山駭浪卻能不驚不懼、一心只想「滅賊報國讎」之愛國豪情。¹³⁷後者作於嘉泰 4 年（1204）隱居家鄉之際，詩人此時雖已 80 高齡，卻對自己首次航海即能穩駕「萬斛舟」、無畏洪濤記憶猶新，由此亦可見出其鎮定沉穩、矢志報國的精神特質與雄心壯志。

又如淳熙 8 年（1181），由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升任廣東提點刑獄、欲至五羊（廣州）履新赴任的楊萬里，其〈清明日欲宿石門，未到而風雨大作，泊靈星小海六首〉組詩以己形象與思維之轉折展現其放達無畏的生命智慧：

風雨來從海外天，靈星海裏泊樓船。坐吟苦句斟愁酒，也是清明過一年。（其

¹³⁴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雅量篇〉，《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92），頁 282。

¹³⁵ 宋·陸游：〈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劍南詩稿校注》，卷 8，頁 619。

¹³⁶ 宋·陸游：〈感昔〉，《劍南詩稿校注》，卷 59，頁 3399。

¹³⁷ 陸游雖出入釋道之間，但仍以尊儒崇經為主。愛國思想，為其思想的基本特徵，其愛國思想形成的原因，除了身處戰亂頻繁的時代因素外，還有家世傳承與師友激勵。例如，陸游：〈自儆〉之二，《劍南詩稿校注》，卷 63，頁 3581，詩云：「經術吾家事，躬行更不疑。」經術為形成其愛國思想的基石；至於薰染其愛國思想至深的師友，則有力主恢復的傅崧卿、李光、曾幾等，以及可託死生的陳彥聲、英概長存的蒙師韓有功與族伯彥遠、節比金石的向子諲、志行高潔的胡杞等。參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6-29。

一)

峽山前夕石間行，泊得船時破膽驚。驚到今宵已無膽，聽風聽浪到天明。(其

二)

石門欲到更無疑，隔海風濤未可期。到得石門非不好，只愁未到石門時。(其

三)

一生行路竟如何？樂事還稀苦事多。知是風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風波。(其

四)

波濤端不為君休，風雨何曾管客愁？自古詩人磨不倒，一樽大笑謝陽侯。(其

五)

石門未到未為遲，小泊靈星也自奇。此去五羊三十里，明朝還有到城時。(其

六)¹³⁸

全詩藉由詩人因風雨而產生的形象變化的描寫，鋪展出其內在由畏而至無畏的心靈轉折歷程。航海，雖然危險，但在生死存亡之際，更能激發生命的潛能與智慧，楊萬里履新途中，因風雨錨泊小海、愁酒苦吟，繼而在泊海中又被驚嚇得無法成眠，深覺往石門海路之驚險難以預期。這番驚心動魄的航海經驗，剛開始時，引發詩人人生苦多於樂的感慨；但很快地，天性「樂觀幽默」¹³⁹的楊萬里念頭一轉、換位思考：這次的海上經驗，不僅僅是風雨侵襲客子，同時也是客子侵入海國，又怎能單方面認為是風雨加諸我身的「苦事」呢？他還領悟到：海上波濤為一客觀之存在，不因人祈而休止，我再發愁也無用，只有以「磨不倒」的毅力面對所有的風雨才是應有的人生態度。思索至此，遂肆懷放達，舉樽笑謝江神「陽侯」，將此行視為一場奇遇，展現出堅毅無畏、樂觀放達的生命智慧與態度。朱熹〈答楊廷秀萬里〉稱其為「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秕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¹⁴⁰，正可作為楊萬里此等「放達」精神的最佳注腳。

¹³⁸ 宋·楊萬里：《誠齋集》，卷15，頁378-379。

¹³⁹ 「（楊萬里）天性樂觀幽默，使他的詩自始自終有一種積極向上、充滿熱情的基調，更使他能擺脫習慣思維的定勢，創造出生動風趣、詼諧幽默的誠齋體。」張瑞君：《楊萬里評傳》，頁286。

¹⁴⁰ 宋·朱熹：〈答楊廷秀萬里〉，收入湛之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頁10。

四、結語

本文從吉川幸次郎唐宋詩風之別的觀點來觀察宋代航海詩代表作近 50 首，並結合詩人的寫作背景，從歷史的視角考察北、南宋詩對唐詩中宦途失意之憂、海上生計之苦、海上軍事之險、送友航行之愁等四種航海之「憂」書寫類型的新變之處，以探知北、南宋詩人面對海上情境時所展現「較富於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精神特質的具體內涵，以及宋詩航海書寫的藝術風格與特徵。

宋代詩人對上述四種唐詩航海之「憂」類型的書寫皆有所承繼。然而，由於北宋詩人比唐人有稍多親海、航海的機會，再加上儒釋道兼容並攝的哲學氛圍影響，無論是宦途失意之憂（如：孔平仲、任伯雨），還是海上生計之苦（如：蘇軾、鄒浩）、海上軍事之險（如：梅堯臣、秦觀）、送友航行之愁（如：蘇轍、郭祥正），大多以輕描淡寫海上風濤，或強調儒之仁愛忠義、釋道之豁達等精神特質作為海上安全憑仗的方式，來淡化這些航海之「憂」。至於南宋詩人，因有更多濱海為官的機會，且因南宋航海事業更盛，「元祐之學」（尤其是蘇氏之學）、佛道更加盛行與國族危機感濃厚等緣故，其面對海上風濤時，幾乎不見航海逆境的書寫，反倒直接以心念的轉換（如：李光、胡銓將孔子乘桴之憂轉為觀海之興味，王十朋、楊萬里轉換欣賞的角度看待海上辛苦的生活）取代海上凶險的書寫；或如陳格、文天祥以「我」直面風浪的決心來展現為國犧牲或除奸的勇氣與丹心，具現出超越航海之「憂」的精神特質。

宋詩航海書寫的風格與唐詩之別，不僅表現在上述四種航海之「憂」的淡化與超越上，還表現在航海之「喜」的新拓。具體而言，北宋航海詩首開「謫歸之喜」的書寫內涵，然因詩人（如：釋惠洪、蘇軾）不同的遭際與學養，這份喜悅中又各自呈顯著詩人或悟禪、或融和儒之堅持與釋道之豁達的獨特精神風貌。至於南宋詩人，更因親海性的提昇、出海動機的多樣，其航海之喜的精神內涵又更加豐富多樣，除了承北宋的謫歸之喜（如：折彥質、李綱）外，還有獵奇之樂（如：陸游、文天祥）、扈從航海之豪（如：李正民、沈與求）、履新之昂揚（如：陸游、楊萬里）等，

透顯出詩人們自在逍遙、進退皆樂、放達無畏、矢志為國等個性化的精神特質。

因此，本文由航海書寫的視角印證了吉川論宋詩相比於唐詩更富於哲學思考與揚棄悲哀之觀點。同時，宋詩的航海書寫也提供了我們理解宋代詩人面對生命風濤時精神風貌展現的另一取徑；更因其書寫了海洋的壯闊與詩人閑淡中有堅毅勇敢的精神特質而呈顯出異於山水、田園、邊塞等傳統詩歌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亦即閑淡自適與激昂壯闊兼而有之的複合性藝術風格與特徵，而對宋代海洋文學研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與貢獻。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漢·劉向撰，清·王照圓補注，虞思徵點校：《列女傳補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晉·何晏注，宋·邢昺疏：《重刊宋本論語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南朝宋·劉敬叔：《異苑》，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第1070冊，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5。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92。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收入《文瀾閣四庫全書》第1076冊，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5。

隋·智顗：《維摩經玄疏》，收入大藏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宋·孔平仲：《清江三孔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文天祥：《文文山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56。

宋·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宋·王安石：《王安石全集》，臺北：自力出版社，1959。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1992。

宋·石介著，陳植鏗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宋·呂祖謙：《宋文鑑》，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354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宋·折彥質：《葆真居士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李心傳編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宋·李正民：《大隱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3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李光：《莊簡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9 冊，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5。
- 宋·李昉：《太平御覽》，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902 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李綱：《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
-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宋·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清道光 13 年讀書堂重刊本。
- 宋·胡銓：《澹庵文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141 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 宋·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1965。
- 宋·秦觀撰，徐培均箋注：《淮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宋·郭祥正：《青山集》，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121 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宋·楊萬里：《誠齋易傳》，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9 冊，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楊萬里：《誠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楊時：《楊龜山先生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4。
- 宋·鄒浩：《道鄉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第 12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鳳凰出版社，

199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京都：中文書局，1984。

宋·羅濬等：《四明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575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宋·蘇軾著，薛瑞生箋證：《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宋·蘇轍：《欒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宋·釋惠洪原著，林伯謙、陳弘學編著：《標點注釋智證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宋·蔡襄撰，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

*元·脫脫：《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94。

清·朱庭珍：《筱園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0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第7冊，臺北：世界書局，1964。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

清·畢沅：《續資治通鑑》，長沙：岳麓書社，1992。

清·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0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清·黃宗羲：《宋元學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佚名：《詩淵》，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0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程樹德撰，程俊英、蔣見元點校：《論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

二、近人論著

湛之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方震華：〈從和戎到拓邊——北宋中期對外政策的轉折〉，《新史學》24：2（2013.6），頁 35-69。

* 王紅杏：《宋代涉海韻文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6。

王瑩：〈論蘇氏蜀學的儒學思想〉，《湖北社會科學》8（2010.8），頁 115-117。

李澤厚：《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周蕪：〈試談畫家李公麟的生平及其創作〉，《安徽史學通訊》2（1958.5），頁 2-8。

邱鳴皋：《陸游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 姚惠蘭：〈論宋代貶謫文人的海南詞〉，《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4：1（2006.3），頁 58-63。

* 夏燕梅：《唐代航海詩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孫盼盼：〈方回《瀛奎律髓》中對梅堯臣「送別詩」的品評〉，《景德鎮學院學報》30：2（2015.4），頁 54-57。

孫海洋：〈來來往往一首詩，禪俗兩不離——論釋惠洪及其詩歌創作〉，《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8：6（2004.11），頁 77-80。

* 徐鴻儒主編：《中國海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張立華：〈秦觀交游考略〉，《石家莊聯合技術職業學院學術研究》2：4（2007.12），頁 8-11。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以翻案詩、禽言詩、詩中有畫為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張瑞君：《楊萬里評傳》，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

張福勛：〈鄒浩及其詩論〉，《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1993.10），頁 51-56。

張劍：〈孔平仲與新舊黨之關係〉，《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2018.1），頁 41-51。

曹艷貞、張學松：〈釋惠洪海南流寓心態變遷〉，《學術研究》3（2018.3），頁 169-174。

- *郭慶財：〈論宋代海南謫宦的渡海詩〉，《中國文學研究》2（2013.4），頁 31-36。
- 陳文新編著：《六朝小說》，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 陳植鏐：《石介事跡著作編年》，北京：中華書局，2003。
- 鹿政：《南宋李正民詩歌研究》，合肥：安徽大學中國文學學科專業碩士論文，2019。
- 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濟南：齊魯書社，1992。
- 楊宏：〈郭祥正「謫仙後身」名號由來及內涵〉，《中北大學學報》29：2（2013.4），頁 67-72。
- 詹堅固：〈宋代蜚民考略〉，《黑龍江社會科學》5（2012.10），頁 147-151。
- 齊慧源、侯家旭：〈從《續世說》看宋代文人孔平仲的儒學情懷〉，《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0（2016.1），頁 102-106。
- 樊波：〈宋代文人畫思潮和李公麟人物畫的審美取向〉，《榮寶齋》4（2006.7），頁 52-63。
- 韓蔭晟：〈補《宋史·折彥質傳》〉，《寧夏社會科學》5（1993.10），頁 76-82。
- 鄒怡：〈從道家洞天到觀音聖界——中古東亞文化交流背景中的普陀山開基故事〉，《史林》1（2017.2），頁 53-63。
- *顏智英：《宋詩海洋書寫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
- *〔日〕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 〔德〕魯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著，郭小平、翟燦譯：《藝術心理學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Peking University, *Quan Song Shi* [Complete Song Poem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1993).
- Guo Qing Cai, “Study on the Relegated Officials’ Sea Crossing Poems of Song Dynasty” in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2 (Apr. 2013), pp. 31-36.
- [*Qing*] Qing Sheng Zu, *Quan Tang Shi* [Complete Tang Poems]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78).
- [*Yuan*] Tuo Tuo, *Song Shi*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Taipei: Dingwen Press, 1994).
- Wang Hong Xing, *Song Dai She Hai Yun Wen Yan Jiu* [The Study on Ocean-Related Verse in Song Dynasty] (Ph.D. Diss., Jilin University, 2016).
- Xia Yan Mei, *Tang Dai Hang Hai Shi Yan Jiu* [Research on Sailing Poem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Master Thesis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11).
- Xu Hong Ru, *Zhong Guo Hai Yang Xue Shi* [History of Chinese Oceanography]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2005).
- Yan Jy Ing, *Song Shi Hai Yang Shu Xie Yan Jiu* [Research on Ocean Writing of Song Poetry]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mpany, 2017).
- Yao Hui Lan, “A Review of ‘Hainan-Ci’ Written by the Exiled Men of Letters in the Song Dynasty” in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4.1 (Mar. 2006), pp. 58-63.
- Yoshikawa Kojiro, *Song Shi Gai Shuo* [Introduction to Song Poetry]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